移民岁月 第十三期 YI MIN SUI YUE

“三线”建设与工业移民（一）

刘天明

解放前，宁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后，一方面立足自身，大力发展工业，另一方面，国家也从外省迁移工厂和技本人员、工人支援宁夏工业：宁夏煤炭工业基地的建设就得到了国家和其他省份的大力支持，调配了大量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和设备进入宁夏，支援宁夏煤炭工业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三线”建设而迁移到宁夏的众多工厂和随迁的大量技术人员、工人，为宁夏工业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宁夏煤炭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移民情况。

1956年1月，煤炭部决定成立石嘴山煤矿筹建处，大规模开发石嘴山煤炭资源。到1957年年底，先后从西安煤矿基本建设局土建队、铜川工程处、北京基建总局、峰峰矿务局、山东泰安以及银川等地区调入职工近千人。1958年矿区基本建设全面展开，按照劳动计划，又从铜川、山丹、兰州、徐州、大同等地区调入建井工人1720人，其他地区调入311人，河北招工2600人，就地招工2922人（大部分也是外地人），年末职工总数达9066人。1959年至1961年接受转业军人152人，外省招收340人，就地招收1133人(多数为外省区自愿来宁人员)。到1961年末，石嘴山矿务局共有职工13718人。到1964年底，石嘴山矿区的职工队伍已经是一个两万人的煤炭生产和建设群体。这是一支不分来历、不讲地区、团结一致、共同建设矿区的强大队伍。这支队伍大多数为外省人。

从1994年出版的《石嘴山煤矿志》人物简介中所介绍的石嘴山矿务局局级领导干部的籍贯来看，全部为外省人。从此书所载的石嘴山矿务局第一任负责人孙昶的回忆录中，也可以了解到外地移民对宁夏煤炭工业的贡献。

又据《石嘴山市志》记载：根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至1957年，市境接受成建制调入的外省职工22000余人（不包括随迁家属和分散前来的职工和亲属）。部分企业的老职工及家属来自外省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工厂的现象突出。如石炭井矿务局一矿老职工主要来自本溪；二、三矿主要来自鹤岗、双鸭山；白芨沟矿主要来自甘肃山丹；大峰矿主要来自抚顺；乌兰矿主要来自阜新。由于矿区布局分散，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了一些方言、生活习惯方面明显区别于周边地区的“外省人文小区”，形成石嘴山市鲜明的地方特色。

除煤炭工业的大量移民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国家也在其他工业领域给宁夏调配了许多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有些工厂甚至整体迁移到宁夏。1956年，上海福康制毡厂由上海市迁到宁夏银川市，并入银川毛纺织厂，为银川毛纺织厂制毡车间，1980年制毡车间从银川毛纺织厂分出，成立银川制毡厂。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职工280余人，迁移时有多少职工随迁不详。银川市红旗服装厂于1958年由南京迁到银川，当时有职工150人和几十台脚踏缝纫机，以批量生产各式男女服装为主。1959年1月11日，《宁夏日报》报道，由上海、南京等地迁来支援宁夏建设的银川被服厂、银川五金厂、银川电料厂、康乐木器厂等15个工厂，短期内纷纷投产，产品上市；1959年，国家农垦部从北大荒军垦部队抽调干部120多人，与宁夏合建银川磷肥厂；1959年12月23日，由辽宁省沈阳河区橡胶二厂迁建的银川橡胶厂建成试产。

石嘴山部分厂矿企业有组织调入职工情况表

年份	来自地区、厂矿	人数(人)	分配（组建）单位
1956	陕西铜川131、132队	580	石嘴山146煤田勘探队
1957	山西大同煤矿	2000	石嘴山矿务局
	山西煤管局	1000	
	铜川矿务局	2000	
1958	黑龙江哈尔滨煤管局	30	
	东北第二基建局	300	
	甘肃阿干镇煤矿	1000	
	江苏徐州基建局	3000	
	河北沧州、保定专区	3600	
1958	上海杨浦区烈军属加工厂、贫民自救社	250	惠农县螺丝厂
1959	天津红桥区回民玻璃厂	89	石嘴山玻璃厂
1964	河北冶金局，天津冶金局，鞍山、本溪、太原、湘潭钢铁公司	565	石嘴山金属制品厂（现宁夏钢铁厂）
1965	甘肃山丹矿务局	5600	石嘴山、石炭井矿务局
	双鸭山矿务局建设公司	不详	煤炭部第81工程处
	吉林第二十一工程处		煤炭部第21工程处
1965	北京有色冶金总院439室、包头钢铁公司、张家口企业	147	宁夏有色金属炼厂及研究
1966-1970	张家口煤机厂（包建）	600多	西北煤机一厂
	淮南煤机厂（包建）	500多	西北煤机一厂
	抚顺煤矿电机厂（包建）	200多	西北煤机一厂
1966-1971	辽宁瓦房店轴承厂（包建）	784	西北轴承厂
1967	黑龙江鸡西矿物局滴道洗煤厂	200多	大武口洗煤厂

支宁老电影人李庆跃的故事

韩胜利

踏着新中国解放的鼓点，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驻银川，开启了在宁夏电影事业的人生。从参与筹建宁夏省人民电影院，到成立宁夏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到成立宁夏电影制片厂，他不仅是宁夏电影事业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宁夏电影事业的先行者、开拓者。一辈子废寝忘食，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精神生活，他总是儒雅谦恭，真诚的微笑中散发着长者的气度和风范。

李庆跃生于1932年，籍贯河北，1949年8月参军，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宁夏新闻图片社主编、宁夏摄影家协会主席，是国家一级摄影师，为宁夏电影事业付出了一生心血。“1949年9月23日，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驻银川。当时，我是第十九兵团电影队的一名放映员，进城后电影队遵照军管会的命令，接管了宁夏三晋会馆电影院（现金凤凰影院所在地），接收了民国政府的全部放映设备，其中有3台16毫米无声放映机、2台直流发电机和20多部无声影片。”李庆跃老人回忆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宁夏省要筹建人民电影院，亟需专业人才，电影作为党的宣传思想领域的重要阵地，部队领导决定让李庆跃留在宁夏配合当地做好建设工作。新筹建的影院是在三晋会馆电影院基础上修缮的，当时的三晋会馆破旧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门窗四处透风、室内布满蜘蛛网和老鼠洞。在院长张志德的带领下，大家拆除了庙式门楼，砌砖涂泥、堵洞洁壁……军管会专门调拨了两匹黑布、两立方米木料用来整修门窗、缝制帘幕。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挡不住电影院职工们的满腔热情，大家天天一身土、一身汗，从早忙到晚，每个人都很兴奋。经过20多天的忙碌，电影院终于初具规模。1949年10月25日，宁夏省人民电影院正式建成。人民电影院上映的第一部故事片是《王宝钏》，黑白片，票价0.15元，连续放映的十多天几乎场场爆满。从1951年开始，人民电影院陆续放映了《白毛女》《钢铁英雄》《农家乐》《团结起来到明天》等18部国产故事片。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各项建设事业都迈向崭新的阶段，电影事业也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宁夏先后成立了宁夏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宁夏电影制片厂、宁夏电影机械修配厂、宁夏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宁夏电影事业的发展。经过几年努力，宁夏电影事业基本上形成包含制片、发行、放映、培训、修配的完整体系。全区电影放映单位也由原来的人民电影院1家逐步发展到13家。

说到宁夏电影，李庆跃谈及更多的还是亲自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龙种》。拍摄张贤亮小说《牧马人》而大获成功的谢晋导演，原本将张贤亮小说《龙种》也列入拍摄计划，为此还特地来宁夏与张贤亮接洽此事。李庆跃听闻后，立即找到自治区党委分管宣传的领导全力争取，最终从张贤亮处取得这部小说的电影制作权。1983年7月17日清晨，《龙种》在银川玉皇阁开机，从未见过电影拍摄场面的银川百姓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了呢。不到两个月，《龙种》杀青，由文化部电影局批准于12月16日面向全国发行。发行之前，新华社专门向全国发了题为《宁夏电影制片厂摄制第一部彩色故事片《龙种》即将同观众见面》的消息。新华社为一部故事片专发消息，这在当时，唯有宁夏电影制片厂获此殊荣。1984年4月30日至5月4日，《龙种》在银川首次公映。银川6家影剧院5天放映169场，观众达22万人次，观看此片人数为当时银川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谓盛况空前。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实行的是中国电影总公司“统购包销”制度，由于影片题材丰富、摄制精良，中国电影总公司出资55万元购买此片永久版权。“除去35万元的拍片投资，《龙种》在上世纪80年代就赚了20万元，可以说是宁夏第一部赚钱的电影。”李庆跃说。

李庆跃说，宁夏电影发展很不容易，经历了创业之初的艰辛、跋山涉水的磨难，也有苦心钻研的创造，他们这代人不仅是宁夏电影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开拓者。李庆跃老人思维敏捷、谈吐清晰，对自己从事电影业的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倾听这位老电影人的倾情讲述，他们的电影故事、时代情怀，让我们从电影的视角看到了社会变迁。

（摘自《守望新闻的岁月》）

新石器时代的宁夏山川

岁月流逝，江河奔涌，人类在蹒跚中步入了“少年时代”。大致距今5000年左右，宁夏平原地区和南部山地出现了不同的原始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反映了当时原始居民在经济生活中的差异以及前后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

作为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一种类型的“细石器文化”，经过考古工作者30年来的发掘整理，在宁夏黄河沿岸各县、市及盐池县等地均有重要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有近30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其中以陶乐县高仁镇、察罕埂，贺兰县暖泉村，中宁县风塘子沟，中卫县长流水、孟家湾的遗存较为重要。这类遗存，大都分布在沙丘或半沙丘地区，由于风力侵蚀，已很难找到原生地层。在遗存中发现的大型石器有石斧、石（石加奔）、石磨盘，小型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箭镞。石器的制作方法主要用“间接压制”方法制成各种细小石器。在这类遗存的石器中往往伴同陶器碎片出土。陶片有细泥纹陶、泥制红陶、夹砂纹褐陶等。这时，原始居民已能修筑单间结构的住室，室内有一圆形火膛和一个保存火种的陶罐，用于饮煮食物和御寒。这种建筑形式，可能正适合于人类婚姻形态上的对偶制家庭。从文化层堆积甚薄和缺少大型农业工具的情况分析，这时居民虽已定居，但只是短暂的，其基本经济形态仍然是半农半牧的游牧生活。宁夏南部的黄土高原，孕育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农业居民。近年来，在隆德、西吉、固原、海源各地区陆续发现了属于“石岭下”、“马家窑”“半山”类型的彩陶和其他遗物。这些彩陶的发现，证明宁夏南部自公元前3800年左右到公元前2300左右，前后有“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三个完整系列。1985年，在海源县菜园乡发现和发掘的墓葬群，则是晚于上述文化的原始居民的氏族公共墓地。从初步发掘的情况看，这时盛行单人葬，排列比较密集，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坑。尚无葬具，随葬品均是陶器。陶器中有少量彩陶罐，饰横向平行条纹，器形、花纹和甘、青地区氏族社会晚期的“半山”类型陶器近似。单色陶器中的双耳小罐与甘、青地区氏族社会晚期的“齐家文化”陶器接近。这为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晚于上述原始文化的“常山下层文化”，广泛分布于固原、西吉、隆德等地区。这类文化遗存的居民，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在固原店河遗址发现有圆形或方形圆角的半地空式居址。从墓葬发掘中发现，一号墓葬陶器达30余件，还有串珠、纺轮、绿松石坠饰和带齿槽的骨片等大量随葬品；而在同一墓地的另一座墓葬中、除在填土中有一夹砂粗陶罐外，只有一件石斧。同一氏族成员在死后随葬品数量出现如此悬殊和差异，反映出氏族社会走向解体。

从宁夏南部考古发掘中，可以了解到人类新石器时代的大致轮廓，对于了解周部族起源之谜将提供许多宝贵资料。 （据新华网）

马海德在宁夏同心

买晓仙

马海德在宁夏同心县改名并参加红军，已为大多数人了解和公认，但在有些影视作品中还语焉不详，甚至只字不提马海德在同心的这段历史。本着尊重历史、尊重马海德的原则，现就马海德在同心的几个核心问题再作一次简要论述，以飨读者。

概述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同秘密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到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后，他俩仍然一同结伴，在红军小分队的护送下又来到西征前线宁夏豫旺堡（今同心县预旺镇），这里是彭德怀的西征总指挥部所在地。

海德姆和斯诺的到来，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西征总指挥部在豫旺堡南塬召开了盛大的欢迎联欢大会，“热烈欢迎美国朋友”的横幅醒目地挂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方，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臻、陈赓、杨得志、聂鹤亭等西征将领出席大会，战士们表演了劈刀、射击、马术等战术。海德姆用刚学会的“同志们好”向大家致意，斯诺发表了支持中国革命的演讲。驻扎在毛居井的红四师，派政工科科长卢仁灿送来两匹上好的战马和慰问信给两位美国朋友。

在豫旺地区，人们常常看到海德姆和钱信忠、戴正启挑着两个白铁皮桶子的“流动医院”走村串户，为民治病，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深得群众爱戴。在与群众广泛接触中，他发现回族多数人都姓马，于是决定自己也要姓马，改名马海德并加入中国红军。

和他同来的斯诺在同心地区采访结束，返回保安又回到北平，继续他的记者生涯，而马海德却在同心留下来参加了中国革命，直到红军集结山城堡，他参加战地救护时才离开同心地区，在同心工作战斗长达4个月。

关于改名

马海德的改名经过，是他亲口告诉同心县党史工作者的。1986年，同心县举办“红军长征胜利暨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活动，派王克林、杨文元进京调查相关党史资料，经程子华帮助联系，找到了当年和斯诺一块儿到同心地区的马海德。因为在这之前，听当地老年人讲，红军西征时来过两名外国人，一名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也明确记载了他到“宁夏豫旺县”前线访问，但另一个人是谁？却在书中只字未提，更没有图像。采访马海德时才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那是我特意关照的，我要求斯诺在采访记录中删去所有有关我的文字和图片。因为我已决定参加中国革命，一是当时的形势还不便公开我这个外国人的去向，二是斯诺报道的是英勇善战的长征红军，我这个刚入伍的新兵也没什么可写的。”

马海德美国名字叫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他的家族是黎巴嫩执政党长枪党一族。马海德虽然出生在美国纽约的布法罗，但父母都是移民美国不久的黎巴嫩人，他的大学也是在黎巴嫩上的医学院，黎巴嫩大学毕业后又到瑞士日内瓦攻读医学博士。海德姆在同心地区施展高超的医术为军民治病。彭德怀特意指示海德姆帮助十五军团发动群众，做回民工作，筹备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马海德回忆当年在豫旺县的这段工作时，突然提高声音愉快地说：“我现在的名字，还是在你们那里改的！”马海德说，作为红军医生，他和老百姓的关系十分融洽，在广泛接触中，他惊奇的发现这里回民多数人都姓马，他就决定也要姓马，在美国名字海德姆中保留海德两字，改名马海德。

他在豫旺参加红军的要求，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批准，从此，在红一方面军的西征战斗序列表中有了一个新的红色战士的名字——马海德，而且一直沿用终生。

关于时间

马海德在同心地区战斗工作了多长时间？也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有两点是统一的，是肯定的，其一是马海德来同心是跟斯诺同时来的；其二是离开同心是随红军主力一块儿撤离并参加了山城堡战斗的救护工作。肯定了这两点，马海德在同心地区战斗工作的时间也就好推算了。

先说到来的时间。斯诺和马海德到达豫旺堡一直没找到准确的日期，大多数记述都是1936年8月。

关于斯诺和马海德离开保安前往豫旺堡的时间，有资料记录是7月9日，以此推算，他们到达豫旺堡的时间应该在7月下旬或8月初，因为200公里左右的路程他们不可能走20多天。他们来豫旺，走的基本是红一军团西征的路线，我们从红一军团到豫旺所耗的时间段，可以推断出马海德到豫旺的时间。

中央军革委5月18日发布西征命令，红一军团19日出征，12天后，也就是6月1日攻占环县曲子镇，又经过阜城、麻岭战斗后，于6月7日进驻豫旺堡。也就是说红一军团西征从吴起出征，包括数次作战到豫旺堡仅用了19天，而斯诺和马海德是直接赶路，所以他们不可能走20多天。虽然他们从保安路过吴起还逗留了几天，但仅仅是3天。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明确记载：“我在去前线的途上，离保安向西北方向走了几天的路程后，停下来在吴起镇访问了一下。我在吴起镇待了3天。”他在第八篇的另一章《“真正的”红军》中记载：“在甘肃和宁夏的山间和平原上骑马步行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终于来到豫旺堡，那是宁夏南部一个很大的有城墙的市镇，那时候是红军一方面军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司令部所在地。”

斯诺和马海德7月9日离开保安，途中在吴起逗留了3天，其余都是直接赶路。对照红一军团从吴起到豫旺堡的时间段，由此推算，他俩8月初到达豫旺堡是准确的。

再说离开的时间。9月7日，斯诺在同心吊堡子准备离开同心返回保安，仍经西安回到北平。而马海德却选择了留下来，参加中国革命。两名结伴而来美国人，一去一留，就此分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再次相见。

1936月11月12日晚上，马海德随红军主力撤出同心城，撤往豫旺县城下马关（今同心县下马关镇）。15日撤出下马关，17日打了萌城阻击战，21日至22日打了山城堡歼灭战。

所以，马海德从8月初和斯诺一块到豫旺堡，直到11月15日从下马关撤离，在同心地区活动达4个月之久。在投身中国革命的这4个月中，树立和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离开同心的3个月之后，1937年2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海德从23岁踏上中国土地，到78岁逝世，半个多世纪奋斗在中国。从上海到陕北；从陕北保安到宁夏同心；从延安到西柏坡；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从十年浩劫到改革开放，他亲历了中国的风起云涌。把自己最好的年华乃至生命的全部献给了中国，献给了他热爱的医疗事业，献给了几十万麻疯病病人。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样一个人：祖籍黎巴嫩，出生在美国。学业完成于日内瓦，真诚服务于陕甘宁。他放弃了原有的美利坚和众国国籍，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他成长在资本主义国家，却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取得辉煌！

（作者系红军西征纪念馆馆员）